

天津近代史

主编 来新夏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近代史



主编 来新夏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2830



南开大学出版社

1172830

天津近代史

来新夏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625 插页11

字数:289千

印数:50,000

统一书号:11301·20

定价:(平) 2.50元

ISBN7-310-00013-7/K·1

(精) 3.75元

主 编
来 新 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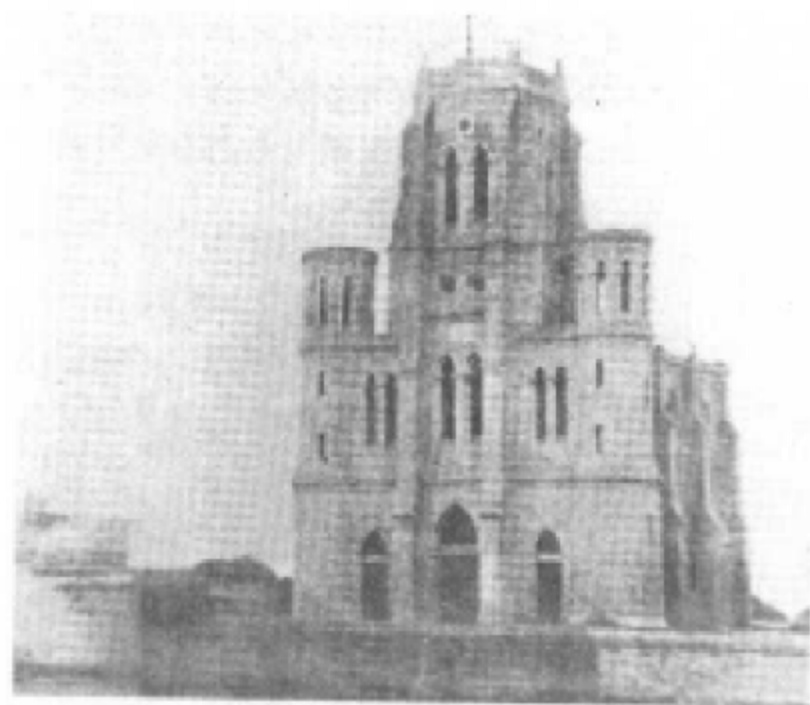
编 写 人

- 林开明——第一至四章、大事简记
张树勇——第五至六章
黄小同——第七章
娄向哲——第八、十一章
林文军——第九至十章
王德恒——第十二章、参考书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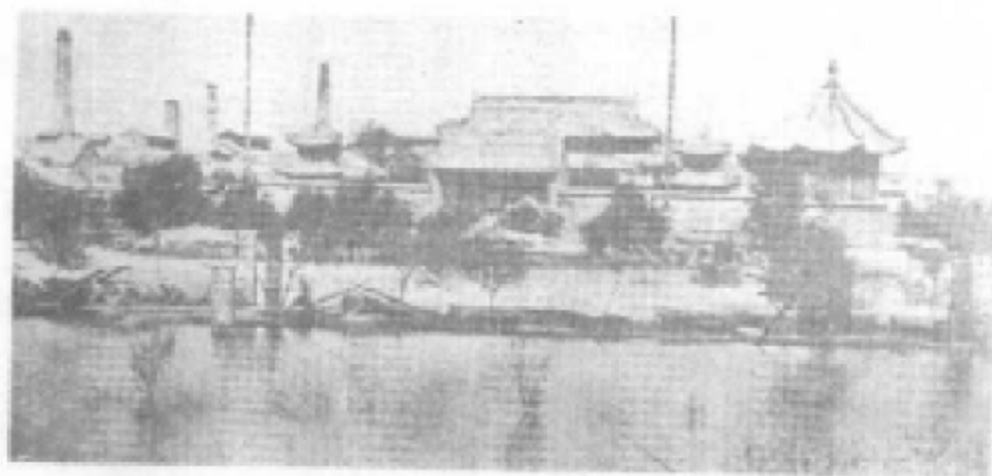


1860年被英军占领的北塘炮台。

1870年“天津教案”中被焚毁的法国望海楼天主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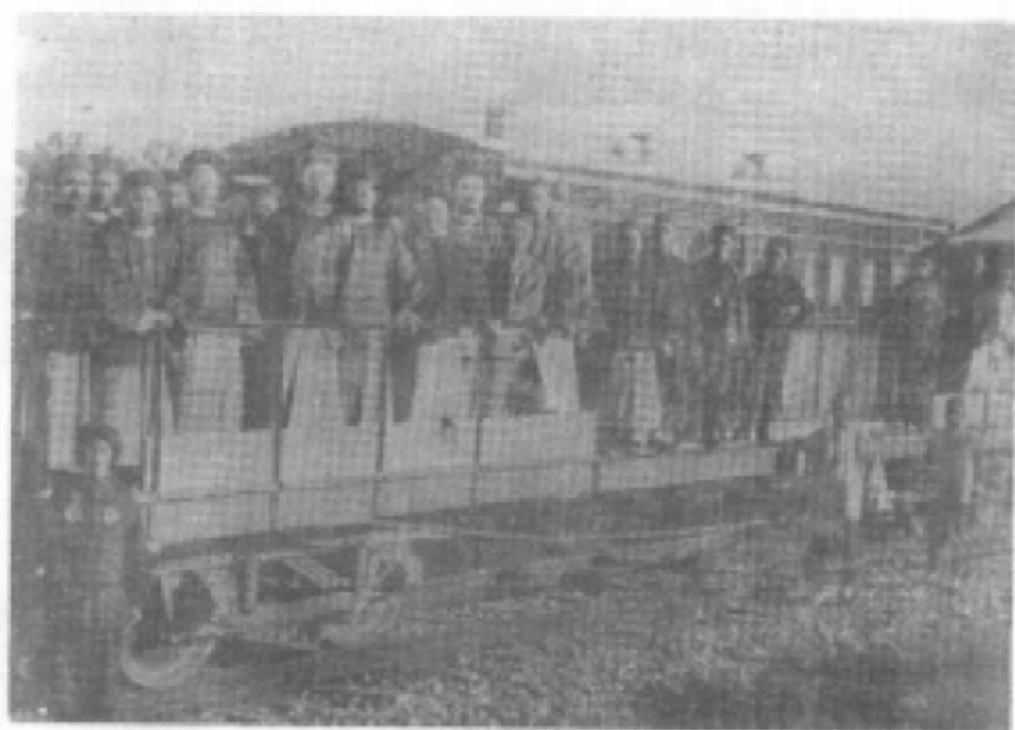


天津机器局
(东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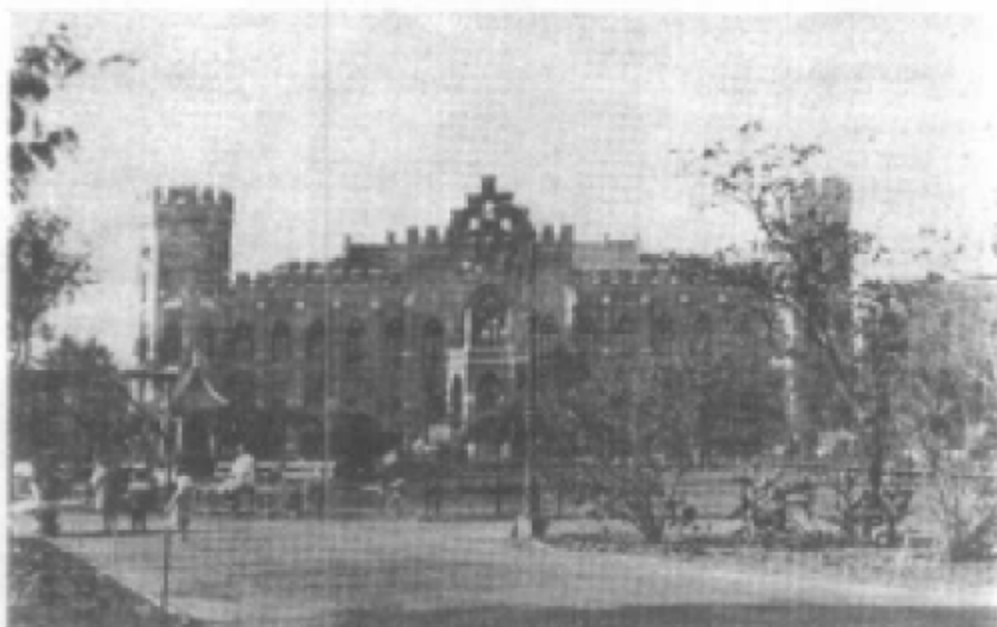


1888年的紫竹林大街（今吉林路一带）。



1888年津唐铁路通车典礼。

英租界工部局所在地——戈登堂
(今天津市政府原址)。



法租界的
安利文洋行。



日租界
—旭街(今
和平路)。

义和团“乾”
字团首领曹福田
设立坛口的遗址
——吕祖堂（今红
桥区西门外如意
庵大街义和团纪
念馆）。



1900年在天津濠墙下被中国军民击伤的美、日侵略军。



1900年被八国联军攻陷的三岔口炮台（即黑炮台）。



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中国军民被屠杀在天津南门城墙上。



沙俄军队在塘沽拆毁民房。



1902年以后的直隶总督衙门东辕门。



天津商会
旧址（今北马
路）。



直隸工藝總局（1903年成立）。



革命黨人
在天津活動舊
址—吉祥里
（原西開教堂
附近）。



被壬子兵变（1912年3月2日）毁坏的天津城北街道。



北京《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导。

1914年，南开学校成立“敬业乐群会”。图为会员合影，前排左一为周恩来。



前 言

天津是我国北方的重镇，首都的门户。如果仅从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它还不足以称为历史悠久；但从它进入近代社会后的急速变化来考察，近代天津无疑是近代中国的缩影。因为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的各种变化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都在天津近代史中有所反映，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所以研究和编写天津近代史不仅有益于理解中国近代史，而且还将提供一部信而可征的乡土教材。这正是我们愿意在过去许多同志所进行的资料纂集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通力合作，编写这部《天津近代史》的出发点。

一

凡是编写一部史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断限和划分阶段。这是史学界饶有兴味地进行争论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和划分阶段问题也有过几次争论，但迄今未能完全定论。具体到地方史，更具有某些特殊性。它既要考虑全国，又要结合地方，因而也出现过一些不同的意见。这部书的开端采取了1840年的传统说法；有的意见认为1860年的被迫开埠，才使天津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其意当以此为开端，这就忽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大沽口的重要史实。至于下限断于1919年或1949年都有一

定的理由。本书只是为了编写便利和有较多同志的分段习惯而以1919年为下限。

天津近代史的划分阶段问题，过去有些同志以“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提出过见解。“两个过程”的论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不过在具体划分时还有某些出入，如有的同志将天津近代史划分为1840——1860年、1861——1894年、1895——1901年、1902——1919年等四段。我们同意四分法，但对第三、四段却略有异议。我们划分为以下四段：

（一）1840—1860年：在此期间，天津屡遭英法等侵略军的进犯；太平军的兵锋直指畿辅、逼近天津；天津原来沉静而凝固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冲击。处于封建末期的清王朝遇到了内外压力而开始发生变化。天津和全国形势一样同步进入了近代。

（二）1861—1894年：这是天津各方面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相继侵入——划分租界、设立洋行、银行、商品输入和资源外流等等，天津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人民不甘忍受欺凌，奋起反抗，出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天津近代史上最早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天津教案”。与此同时，天津还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举办了多种军事和民用工业，使天津的城市获得发展，民族经济开始起步，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

（三）1895—1911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我国更沉重地遭受各帝国主义的欺凌，但是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不甘屈辱、力求富强的意愿。尽管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强化，仍无法阻止民族经济的振兴和人民大众的奋进，从而引发了结束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极关重要的历史标志，天津同全国一样应当在此划一阶段。

（四）1912—1919年：北洋军阀篡夺辛亥革命成果所建立的北洋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给天津带来了灾难，特别是以天津为巢

穴策划复辟活动的翻云复雨，遭到了天津人民针锋相对的抵制。“老西开事件”的反法帝国主义斗争，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兴作了一次重要的表演；但更重要的是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起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把天津近代历史推向另一个新的阶段。

这样的四段分法既突出地反映了天津近代史的历史真貌，也大体上沿着中国近代史发展轨道进行。本书编写时虽然没有按段明确标出篇章，但基本上是依照这四个阶段的层次来描述天津近代这一历史时期的。

二

本书的编写者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天津近代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来写的。但是，这个“缩影”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摘编或缩写，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近代天津的历史真实。我们从研究天津近代史实入手，它所展现的历史图卷对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重大事件几乎都有所反应，只不过层次有高低、时间有先后、规模有大小而已。所以天津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缩影的说法是对天津近代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

在编写这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在掌握较丰富的资料和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仅只是一种再编纂，而是进行了历史的反思。我们认为历史的反思是要重新认识历史，并尽最大努力体现历史的真貌。本书采取了不少已为史学界较多人所同意的观点。有些则由于我们根据发掘和掌握了信而可征的资料，经过考辨、分析与研究提出了某些见解和看法，这里只举例说明，如：

（一）关于天津近代史上反侵略反帝斗争问题：过去往往不论时代背景，仅作共性认识而忽视特性分析，以致不易看到斗争

的发展。天津近代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反侵略反帝斗争，即

“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和“老西开事件”。它们的斗争性质基本一样，但其斗争规模、斗争艺术和本身的弱点又各有不同。“天津教案”是近代早期的反侵略斗争。它以城市居民为主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则支持和推动了斗争。这次斗争由于时代局限带来了因东西方观念冲突而产生的若干反教排外行动，但它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揭露了清政府的媚外，显示了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不同意把这次斗争认作是城市游民一哄而起的盲动行为的说法。义和团运动比“天津教案”的纯自发性斗争有所发展。它是粗具组织，抱有共同信念的一次反抗斗争。它虽在策略上有些不明智，采取了盲目仇教排外，甚至一概排斥西方物质文明的行动，使斗争蒙上了某些愚昧色彩，但它确是一次重大的反帝运动，制止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我们不赞成片面强调义和团愚昧、落后的说法。“老西开事件”则大异于前，因为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天津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天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壮大。它充当了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的领导者，在政治舞台上作了重要的表演。它远远超出“天津教案”和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斗争水平。它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群众，恰当地运用斗争策略，终于取得了胜利，为天津近代的反帝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们改变了未能充分估价天津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

由于对同一性质事物进行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不仅加深了对事物本身的理解，同时也从发展趋势中给人们以鼓舞，激励人们的前进斗志。

（二）“洋务”事业的评价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天津是北方的“洋务”中心，举办了为数不少的军事和民用企事业。举办这些企事业的目的，当然主要是清王朝为加强镇压人民的力量以维护其封建统治；那些办“洋务”的人还夹杂着和顽固守旧势力争权夺势的

动机。这是无需置论的一个方面；但又不能不同时看到，他们在“富国强兵”的愿望方面也具有希图与外国侵略者争衡的因素，因而这又是一场封建政权“自强”、“求富”的自救运动，而举办“洋务”所建立的若干工矿企业在客观上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产生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改变了近代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且还为近代工业培植了技术骨干力量。

（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侵入的问题：它们的侵入给天津近代历史带来了灾难。它们的侵略罪行应引起我们的痛恨而予以揭露和指斥；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文化诸方面所造成的客观影响究应如何估计？却又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例如设立学校、医院和办报等，它们主观上是含有侵略目的；但在传播西方文明和先进技术方面，对我国封建传统观念所起的某些冲击作用，并曾对近代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过的思想影响等客观效果都应加以分析。不过，对这些客观效果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因为这些是我们“挨打”的副产品，不足为训。

（四）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天津近代史上有不少见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他们有些已有所谓定评，但若从他们在天津的具体活动来观察，其评价却又有歧异之处。如袁世凯是历来被贬责的人物；但他于二十世纪初在天津推行的“新政”是有一定成效的。袁世凯的“新政”主要包括有变革军制、兴办巡警、考核吏治和创建实业等等。它们都对天津近代社会发展有利而难以一概抹煞的。即以在天津练新军而言，这是我国近代化军事制度的开端，在当时全国编练的新军中，它以装备精良、训练严格和器械充裕而首屈一指。它不仅使封建统治者耳目一新，还引起帝国主义的注视。“北洋实业”在倡兴工艺、发展经济和扶助国货等方面也都有积极成效。虽然，这些“新政”还包含着不利于人民的另一面；但总的看来，它在客观上对稳定社会秩序、改革旧制、发展社会经济诸方面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应给袁世凯以恰